



跨文化
齐泽克读本

The Cross-Cultural Žižek Reader

“海上潮声文化艺术丛书”主编 刘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上潮声文化艺术丛书”主编 刘康

跨文化
齐泽克读本

The Cross-Cultural Žižek Reader

徐钢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齐泽克读本/徐钢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海上潮声文化艺术丛书/刘康主编)
ISBN 978-7-208-10439-6

I. ①跨… II. ①徐… III. ①齐泽克, S.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5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6610 号

责任编辑 郭立群

封面设计 姜明

· 海上潮声文化艺术丛书 ·

刘康主编

跨文化齐泽克读本

徐钢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10439-6/G · 1482

定价 28.00 元

海上潮声文化艺术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刘 康

编 委

吕彤邻 王 宁

贝淡宁(Daniel A. Bell) 成中英(Cheng Chungying)

徐 钢 周永明

葛 岩 谢耘耕

书 云(Shuyun) Jonathan Fineberg

Toril Moi David Paletz

Kenneth Surin Marshall Brown

J. Hillis Miller Haun Saussy

David Damrosch Doris Graber

总序

刘康

人文与社会研究在中国从来就有经世济国的传统,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更承担了人类文明的反思、规划、批判、纠偏的重任。关于“道”和“术”的探索、纯学术的追寻和实用、实践的关注,始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在今天的中国,当代问题乃是人文与社会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国现代化跟全球化进程同步,30年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亮点。转型中国既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复兴和崛起,也标志着现代化、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融合了西方数百年来现代化的经验成果与中国数千年的独特传统和文化遗产,向世界昭示了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之外的不同选择。在思考多元、多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人文艺术以及更广义的文化和社会的领域今天成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聚焦点。东西方融合、南北汇聚的新“文艺复兴”时代,正在浮出地平线。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创新的冲动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研究也更加令人振奋。

1979年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国门打开,文化开放、学术开放,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把西方20世纪以来的思想、流派和观念引进来,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是个总体目标和过程,对于经济体制来讲,偏重的是改革;而对于文化和学术来讲,更多的则是开放。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顺改革开放大潮应运而生,特征是全球视野和比较方法。

回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与人文学术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显然是一个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主导,解读、阐发中国问题的轨迹。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并且高度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

推动中国前进的。当然,延安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总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人文社科轨迹,可概括为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

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解读中国问题,形成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繁荣。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了?还是仅仅是一个有着区域性影响的大国?怎么才能算是世界级大国?

对于中国学术全球化战略机遇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来考虑。所谓国际模式(或曰国际化模式),有以下要点:1. 掌握国际话语权;2. 建设国际性的学术团队;3. 设置国际学术议程。所谓国际话语权,是指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研究要突破两个障碍,或两大痼疾。一是突破西方话语的支配地位,找到自己的声音与语言。二是真正做到中国学术的国际化,突破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学术卡拉OK化倾向,要在国际平台上大量发表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要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有国际性的学术团队,从而真正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文学科的与国际接轨,许多情况下是与西方汉学接轨,因为西方汉学家懂汉语,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西方学术关注中国问题多少年来主要限于汉学界。但是近十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汉学(sinology)是研究古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是针对现当代的。但这些基本上在西方属于较边缘的学科。但现在西方的主流学术界已经突破了语言、文化的障碍,以前他们不敢涉足中国问题,觉得不懂中文,没有资格来涉足中国研究。由于当下中国在上世界上巨大的作用,所以西方主流学术界不得不关注中国,打破了语言的限制和学科局限。主流学术界都来关注中国,并且在观察研究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在反思他们基于西方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

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仅仅做理论消费大国,而应该考虑成为理论生产大国。现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也认识到这一点了,但真正要成为理论生产国,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从中国做起。中国学术研究要以设置国际学术议程为目标。中国学者能够提出话题,让各国重要学者围绕这些主题开展研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跟着别人说。至于中国学者主导国际议程,就我有限的了解,在人文学科中还很少。

我们这套丛书,是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聚集的一批人文社科的国际学者为主体,为中国学术国际化做一些探索。丛书辑录了中国(包括在中国任教的外籍华裔、外籍外裔)学者和外国学者的专著、论文集,就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最前沿人文与社会话题展开研讨。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丛书,让不分国界和语言肤色的学者们对话与争辩、合作与交流。在关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同时,关注学术自身的理论创新、学术创新。我们不仅仅要打破地理、物质和精神的疆界,跨越现有学术分类与机制的樊篱,而且要在自由、独立、理性而富于激情的氛围中,开拓思想和想象力、创造力的新的空间。在今天这个网络新媒体的时代、新兴的文化形式正在形成、文化自觉面临新的高潮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像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平台,来让我们的人文与社会学者交流、传播他们对当代问题的最新思考和探索。

2011年12月1日

编者序

徐 钢

千禧年之交,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思想界也是一片百花齐放的景象。和18、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的前70年相比,能够跨越多种人文学科的思想的巨人已不再可能存在。这和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有关,也和资本主义成功的全球化分不开——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最小化使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赖以生存的“氛围”(aura,即自然的距离,以及超越个人最直接利益的长远社会关系)不复存在。当然,对思想巨人的期待的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对于权力/知识吊诡的论述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超越性的、跨文化性的、中性的、全面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根本性矛盾会倾向于制造一个错觉:会有一个伟人,政治上的或是思想上的,可以解开所有的社会谜团、破解所有的政治经济危机,而在实际上穷一人之力,如当年的马克思那样,已不可能超越这些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而产生“元理论”。

不过,当代仍然有睿智的学者和充满人文关怀的左派社会活动家一点一点地刻画出全球化的根本性危机和人类面临的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们不求发展一个可以包容一切的元理论,而是以一种激进的革命姿态和伦理态度力求理解各种危机之间的关系,试图教育人们更加宽容却也更加具有斗争性,不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所制造出的各种现实中的假象所迷惑。这些人也许不再是也不屑于做思想的巨人,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人类思想的贡献不小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斯拉沃日·齐泽克(Slavoj Žižek)便是其中最有个性也最有穿透力的思想家。

齐泽克和其他当代理论大师最大的不同是他的东欧的“第二世界”的立场和不为美国的大学“招安”的矜持。他于1949年生于斯洛文尼亚的首府卢布尔雅那,除

了短期的学习和出国讲学外,那儿就一直是他读书、工作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他先是获得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又在巴黎得到了心理分析学的博士,现任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哲学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他和一批年轻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开始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也连带着开始对德里达、福柯、阿尔杜萨等其他的法国思想家的研究,出版了翻译法国理论的月刊《问题》(*Problemi*),并于 70 年代末出版丛书《论析》(*Analecta*),阐释并应用拉康学说。国际学界也就慢慢有了“斯洛文尼亚拉康学派”的说法,指的正是齐泽克和他的朋友们:玛拉·博加维奇(Miram Božovič)、扎乌克·科比(Ždravko Kobe)、玛登·多拉(Mladen Dolar)、瑞纳塔·塞来策(Renata Salecl),以及阿连卡·祖潘齐基(Alenka Zupančič)。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出发来重新审读古典和当代哲学;第二,阐释并进一步发展拉康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理论;第三,以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为基础来细读文化和艺术,特别是电影。这个学派先是在欧洲享有盛名,再于 90 年代在美国广受瞩目,大量出版英文专著,对拉康学说在美国各个人文学术领域的发扬光大影响深远。齐泽克更是成为美国各所名牌大学争相聘取的对象,他自己却一再推托,不愿离开他在欧洲的学术土壤。不过,他们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斯洛文尼亚国内并不受重视,倒是他们在斯洛文尼亚与南斯拉夫联邦脱节的动荡时刻身体力行的政治实践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齐泽克,更是积极参加竞选,并于 1989 年成为总统竞选人。对齐泽克来说,竞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要的是一个公众的讲坛,可以大力地反对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由于齐泽克和其他各派知识分子的反对声浪,狭隘的沙文的民族主义才没有在斯洛文尼亚占上风。而在其他的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中,联邦的解体催生了实力强大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再在国际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导致了后来的种族间的混战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干涉。相比之下,斯洛文尼亚没有发生战乱,经济持续发展,并于 2004 年以欧洲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顺利地加入

欧盟。时至今日，齐泽克仍然活跃在斯洛文尼亚以及全欧洲的政坛上。^①

要想理解齐泽克的思想，拉康也就成了关键。齐泽克一再强调的是早期和后期拉康思想的不同。以1959—1960年间的“精神分析学的伦理”(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系列讲座为分水岭，拉康学说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不再深究欲望的辩证法，而是注重于“快乐”(jouissance)的隐藏性；从强调“症状”(symptom)为一种有隐藏代码、有语法规范和语义规则的信息，到转为强调“罪症”(sinthome，拉康发明的一个新词)——充满快乐而又无法在意符的世界里或在语义的原则上让人彻底阐释；不再坚持无意识是一种结构井然的语言，转而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不可“消化”、不可阐释、像宇宙黑洞一般的内核。对“jouissance”的发现和认识无疑是拉康前后期根本的转折点。

拉康喜欢用庄生梦蝶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快乐”，以及什么是与其相关的“凝神”(gaze)：

“在梦里，他是一只蝴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他将他的现实世界中的蝴蝶本身看成是凝神。……当庄子醒过来的时候，他问他自己是不是在蝴蝶的梦里，他怀疑不是他梦见了蝴蝶，而是蝴蝶梦见了。他再正确不过了，而且是双倍的正确。首先，因为这个疑问证明他没有发疯——他并没有把自己和庄子完全等同起来；其次，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多么地正确。事实上，正是当他是蝴蝶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身份认同的根源之一——他在本质上曾经是也仍然是那一只蝴蝶，用他自己的颜色来画出五彩缤纷的自己；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他才是庄子本人。”^②

拉康的影响深远的讲座是典型的“述而不作”，由其学生整理出来的讲稿充满了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也免不了有重复、零碎和晦涩难懂的地方。这一段关于庄子

的论述便是一个例子。齐泽克的贡献是将拉康后期的思想系统化、简洁化,用通俗文化,特别是电影的例子来说明拉康不易明白的地方。就拿这一段话来说,齐泽克先是阐明“凝神”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一个部分:“凝神是客体上的一个点,是在这个点上主体借助客体来反观自己,就好像是客体在看主体一样。”^③这样反观到的主体和原先的主体一定有所不同,因为“凝神”这一点是不可能出现在从“凝神”所看出去的视野中的,这是“多余的一点”(objet petit a)。我们可以这样想想看:如果我们把视线集中在某一点,再从这一点回过来审视自己,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自己也就缺了这一点。庄子由蝴蝶眼中所看到的庄子也就不是原来的庄子了,而这样的认识恰切是一个健康健全和快乐的主体所必须有的。如果庄子坚持认为蝴蝶眼中的庄子就是原来的庄子,没有一点的缺失,那他就有了精神上的错乱。作为客体的一部分的“凝神”被齐泽克解释为一个黑洞一样的东西,有了它、有了缺憾,才有主体在意符世界中的稳定性和健康性。反之,对主体全知全能的坚持,认为自己和想象中的自己是绝对严丝合缝地合二为一的肯定,正是精神错乱的表现。从齐泽克的解说中,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拉康说庄子的正确恰恰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正确。庄子从蝴蝶的梦中醒来感到的一种巨大的快乐,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而快乐。对于拉康来说,这是因为庄子在自身和蝴蝶反复的相互审视中感到了盲点的存在,感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种在意符世界中无法表达的快乐已经超越了一切快乐的准则,而成为 jouissance。我不愿意在这里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道学硬扯在一起,可是 jouissance 和道家的“道”的确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对应,至少在语言的不可表达上是一致的:庄子所谓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说的不正是这一层吊诡吗?

也正如道家所强调的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拉康学说从 jouissance 出发而质疑现实的“真实性”。对于拉康来说,“现实”(reality)和“本真”(Real)是不同的,我们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的考验”(Realitätsprüfung),

更来自于一个“超我”(superego)的命令：“一切本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实就是现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天生如此的、不可置疑的。这种现实的不可置疑性恰恰是“本真”，既非主观上的想象，也非意义符号——语言等等——的建构，而是客观上的“凝神”——一切对于现实的肯定永远已经是一种主观的肯定，而这种主观的肯定必须要经过客观的“凝神”，在现实里面也就有了一个永恒的黑洞和缺失；本真的作用就在于让人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现实里面并没有什么黑洞，任何事物都逃不出现实以外。这样的现实实际上并不是现实，而是本真“让你看的现实”(given-to-be-seen)；本真的机制是一种排除的机制，可是它排除的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排除”本身——对于现实必须要排除“凝神”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

齐泽克一再强调，没有比电影更能传达拉康精髓的媒介了，因为电影恰恰是建立在作为客体的凝神和声音之上的。一部电影成功与否取决于观众能不能认同于电影里的人物与故事，能不能被电影里的叙述的声音所催眠而达到全神贯注的程度，而又允许观众与电影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清楚地知道“电影里的情节不管多真切都还是电影的虚拟真实”，可以随时回到让人觉得稳定又安全的现实里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可以将电影看成是“凝神”，由那一个多余的点来观照我们的主观上的身份认同。如果有哪一部电影，以一种自我折射的方式有意渲染电影的这种特质，那么这部电影通常都会被齐泽克所引用来证明拉康关于现实的理论。所有希区柯克的电影都是齐泽克的最爱，他甚至还写过一本书，叫做《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最吸引齐泽克的当然是希区柯克所特有的对精神分析学的痴迷和在电影上表现出的心理深度，不过，齐泽克所强调的不是希区柯克在如《中邪》(*Spellbound*, 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等电影中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近乎抄教科书一般的应用，而是希区柯克通过镜头的运用和场

景的安排所不经意产生的迷离恍惚和莫名恐怖的氛围。比如，齐泽克就用这种氛围来解释“凝神”和主、客体的关系：

“希区柯克是怎么样拍一个人物走近某种神秘的和奇特莫名(uncanny)的物体的景象的呢？他交替使用离那个物体越来越远的主观镜头和记录人物走向物体的客观镜头！在众多的例子中，我只举两个，每一个都是由一栋房子作为那个奇特莫名的物体。第一个是在《狂躁病人》(*Psycho*)快到大结局的时候，莱拉走近贝兹夫人的房子；第二个是《群鸟》(*Birds*)中著名的一幕：梅兰尼走近米奇的母亲的房子。在这两个场景中，镜头不断地由女主人公眼中所见的越来越远的房子切换到展现她正在走向那个房子的全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摄影上的技术安排会产生巨大的焦虑感？为什么那个被接近的物体会显得奇特莫名？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正是观看和凝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主体看见的是房子，不过却有一种奇怪的焦虑感，觉得房子本身已经在窥视她，那个窥视的视角不在她的视野的范围内，从而让她觉得非常地孤独无助。”^④

从凝神出发，齐泽克进一步解释现实和本真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喜欢用的电影的例子包括最近的《黑客帝国》三部曲(*The Matrix*)和《第十三层楼》(*The 13th Floor*, 1999)等等。这些电影确实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和有效的反讽。那一个在《黑客帝国》最后一集的最后场景中出现的像刺猬一样的机器的核心不正是“本真”或者说是 *jouissance* 吗？这个本真以一种不可置疑的超越一切人类的力量创造出现实的幻象，让芸芸众生乐在其中而不去顾虑自己被操纵的可能。这样的本真是不能摧毁的，因为其消失也就意味着人类主体的身份认同的消失，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作为人类的救世主的尼尔只能和机器达成暂时的和平协定，并以共同消灭“史密斯”——出了问题、不再受本真所控制、一心一意要将全世界都变成其化身的

“软件”——为条件。这不正是一种对“排除”的排除吗？

除了电影以外，齐泽克还关心几乎所有的通俗文化的形式，包括歌剧、互联网、玩具（如出自日本的电子鸡 Tamagotchi）等等。虽然他的思想对当代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齐泽克不是为了研究文化而研究文化。文化所提供给他的是实际的例子，他用来证明、阐释拉康理论，并进一步思考哲学上的问题，也用来阐明意识形态的本质、操作规律和方式，并批评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现状。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先是把意识形态归纳为三个方面，再一一指出它们的问题，最后触及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1）构成意识形态概念机制的各种信仰、争论、基本假设和论证模式；（2）为保持意识形态的主宰性而设立的各种政治机构、仪式和社会组织；（3）与机构性的、思想性的政治操作相对应的在各种日常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自发的”意识形态，比如消费观念、对子女的教育理念等等。对齐泽克来说，当代理论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最大的误区是各自研究一个方面：要么是“话语”（discourse），也就是第一个方面，似乎话语和机构是分开的；要么是阿尔杜萨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似乎政治机构的机械性的运作可以决定一切话语的吊诡；要么是强调主体性（agency）脱离意识形态操纵的可能性，可是又硬性地区分开意识形态的“内”与“外”。归根到底，齐泽克强调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幽灵”，一层幻影，其作用是掩盖本真和现实之间的不同和填塞它们之间的距离。现有的对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单独的理解正是这个幻影的一部分，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并表达出事物本质的所有层面而忽略了本质中有不可用意符来表达的“黑洞”。

我第一次见到齐泽克是在 2002 年的 4 月。我们伊利诺大学请他来做一段时间的高级研究员，也顺便参加我们比较文学系组织的关于全球化的国际讨论会。他在我们学校一系列的演讲都引起师生的轰动，不是因为他的有名，而是因为他的风趣、幽默。他以斯拉夫腔很重的英文充满激情地、像连珠炮一样快速地讲着流行

文化里一个又一个笑话,又很快地回到当代的世界政治里面来,语锋犀利,剖析透彻,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化的知识分子的焦虑感、责任感和伦理意识。在讨论会上,我和他各自讲评对方的文章,有争论也有妥协,在会后便成了朋友。作为一个以欧洲的身份认同而自豪的知识分子,齐泽克的洒脱甚至散漫的做派和美国的学者有很多的不同。他不像美国学者那样地学究气,也没有美国学者在学术范围内的循规蹈矩和对专业化的近乎病态的苛求。对于他来说,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罪症”,包括他自己对消费社会的好奇和对美国消费方式的感慨。有一次我陪他逛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商店“最佳交易”(Best Buy),只见他一个人奋勇地向前冲,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念叨着“罪虐”、“罪虐”,在短短的 15 分钟内用现金买了一千多美元的音乐 CD、电影 DVD,外加一个便携式 DVD 播放机,还不忘把店员都逗得前仰后合。彻底地沉浸到 *jouissance* 中去,以最自然和自由的姿态对待他所批判的日常生活中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便是齐泽克最激进之处。

作为一个前公有制国家的公民,齐泽克很自然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好奇,不停地问我这个“社会主义的同志”关于中国的问题。这几年更是不断地通过电子邮件和我讨论有关中国的话题。虽然他或出版他著作的出版社从未授权过任何一家中国出版社,当我把在中国书店收罗到的他的著作的六七种中文译本交给他时,他还是非常开心,对于他在中国的被接受感到吃惊和兴奋。我们最终商定在中国出一本齐泽克读本,不是为了要争唯一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读者更进一步也更清晰地了解当代的全球化的世界和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为此,齐泽克亲手挑选了他最新的关于全球政治和文化的文章,也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了一个序。之所以要把书名定为“跨文化”,是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对西方理论的翻译,而是专门在跨文化的语境(欧洲,美国和中国;法语、德语、英语和中文)中为中国读者而写,为中国读者而编。随着中国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西方的理论批评视野中,类似这样的实践会越来越频繁。

连同齐泽克的序，全书一共有八篇齐泽克的文章。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导读。

在齐泽克的序中，他把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看作是西方主体性的“凝神”，不可捉摸，在一片不可思议的惊叹中保持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中国的奇迹给理论带来了三个挑战：第一，到底有没有“另类的现代型”的存在？第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仍然是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定义的那样吗？中国的发展到底是特殊性的一种还是代表了普遍性？第三，在一切向经济看齐的时候，在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下，我们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所提倡的激进的革命？关于第一点，齐泽克认为一切关于“另类”或“多样”现代性的讨论都忽略了现代性所代表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关于第二点，齐泽克提出了他的政治批评的核心的逻辑：特殊性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普遍性就是特殊性，“差别不在于特殊性中，而在于普遍性中。普遍性不是一个包含特殊性内涵的容器，不是平和的衬托和撮合特殊性之间冲突的背景，而是其本身便是水火不相容的充满矛盾充满冲突的场所；至于特殊性的种类的繁衍，从根本上来说，只不过是各种不同的掩盖/调解/掌控这普遍性中根本矛盾的尝试而已。换句话说，普遍性代表的是一个死结问题的场址，而特殊性则是对这个死结问题试图作出解答的各种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普遍性当然就是意识形态对“本真”和现实之间差别的掩盖。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变异，而是“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终极测试”。

关于第三点，读者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不希望有人误认为齐泽克是在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肯定。毛泽东的遗产不是革命本身，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民生困难。齐泽克所要区分的是毛泽东理想中的彻底的激进的革命和嘉年华会式的对秩序的短暂的颠覆。“革命是永久性的”，齐泽

克强调说。在今天这种资本主义全面开花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正常’的生活被‘嘉年华化’了……不间断的自我革命，颠倒转换，危机重重，不停的再造，而从一个‘稳定’的伦理角度出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正好成为例外”。越是稳定，越是积极地以一种伦理的高姿态排除政治体制中不稳定的因素，便越是充满了纯粹革命中的暴力不稳定因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可以抗拒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普遍性。

对齐泽克来说，欧洲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伦理角度”。在《欧罗巴的前世今生》(*Was Will Europa*)一文中，齐泽克先是剖析了自斯洛文尼亚至全部欧洲在美国“反恐战争”压力下的尴尬情形。他清楚地指出欧洲有两个并存的现状：一个是向美国妥协并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的欧洲，一个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的欧洲；前一个欧洲不得不支持布什政府，而后一个欧洲竭力反对美国通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两个“欧洲”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被视为普遍性民主的象征，有别于基于生活的特殊性的传统道德观，而在另一方面则像一种怪异的变形，一种扰乱理想宇宙平衡的帝国主义扩展及霸权，一种极端过分的傲慢象征。齐泽克在文中集中讨论三个论点：其一，“欧洲”同时指代这两种意识形态；其二，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重叠点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民主遗产；其三，这遗产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更值得争取。一个有着共同历史认同的欧洲是对抗世界新霸权主义的必要条件。

为了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我们在这里选了一篇长文：《意识形态的幽灵》(*The Spectre of Ideology*)。因为我在前一部分已经大致介绍了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论点，关于这篇文章就请读者自己去领略齐泽克争辩的精妙细微之处。

接下去是一篇关于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他们控制了伊拉克，但他们能控制自己吗？》(*They Control Iraq, But Do They Control Themselves?*)，这是齐泽克